

自我控制、情绪调节与运动反社会行为 ——比赛情境下的调节机制

朱媛鶴¹, 张伟鹏², 沈敬尧¹

(1. 韩国又石大学 体育系,韩国 全州 55342;2.天津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天津 300382)

摘要: 目的 在比赛情境下运动员的情绪调节对自我控制和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并检验心理复原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提供更好的指导和解释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行为。**方法** 对北京市和天津市运动队中388名运动员进行问卷测试调查,采用SPSS25.0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使用MPLUS 8.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与结论** 对我国运动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中,应该注重培养运动员的自我控制能力、情绪调节和心理复原力。这些方面的培训和训练可以提高运动员的行为素质,使他们在竞技比赛中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状况和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表现,同时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 自我控制;情绪调节;运动反社会行为;心理复原力

中图分类号: G80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23)07-0589-05

Self-contro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port Antisocial Behavior: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a Competition Situation

ZHU Yuanjiao¹, ZHANG Weipeng², SHEN Jingyao¹

(1.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Woosuk University, Jeonju 55342, Kore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thletes' emotion regulation on self-control and sport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ompetition situations, an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is context, in order to provide better guidance and explanations of athletes' behaviors during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test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388 athletes in the sports team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and the survey data were collated and analyzed using SPSS 25.0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MPLUS 8.0. **Results and Conclusion** In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education of our athlete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athletes' self-control,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raining and coaching in these areas can improve athletes' behavioral qualities and enable them to better cope with various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in competitive games.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to improve athletes' performance, but also help to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self-control; emotion regulation; motor antisoci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在体育领域,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从不同方位对体育伦理道德进行界定和定义。研究表明,体育背景为研究反社会行为提供天然实验室^[1]。运动反社会行为是指运动员个人对他人造成伤害或不利的行为^[2]。近年来,随着竞技体育蓬勃发展,并对商业化和公利化过度强调的问题提出质疑,运动反社会行为事件频繁发生,给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成为一大不容忽视的体育社会难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3-4]。目前,对运动反社会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争

对手方面^[5-6]。然而,最近一些学者指出,队友之间也存在辱骂、嘲弄、讽刺等运动性反社会行为^[7]。愤怒和攻击性水平较高的运动员也更容易表现出作弊或试图伤害其他运动员等反社会行为^[8]。这些行为可以概念化为意图伤害或不利他人的自愿行为^[2]。反社会行为似乎也依赖于自我控制。例如,有学者提出,当参与者的自我调节能力受损时,不诚实行为会增加^[8]。

自我控制是人类人格中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结构之一,使我们能够适应环境^[9-10]。这种结构与个人和社会的多重利益相关^[8]。反社会行为似乎也依赖于自我控制。例如,有学者提出,当参与者的自我调节能力受损时,不诚实行为会增加^[8-9]。也有学者发现,自控力高的人比自控力低的人有更好的成绩、更安全和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少的愤怒和反社会行为^[11]。班杜拉的自我调节理论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类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可以通过个体产生的结果来对思维、情绪和行为进行一定的控制。这个理论认为,个体的反社会行为

收稿日期:2023-06-02

第一作者简介:朱媛鹤(1997~),女,天津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运动心理学,E-mail:1250435124@qq.com。
通讯作者简介:张伟鹏(1991~),男,天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运动心理学,E-mail:zwp0701@naver.com。

可能是由于缺乏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导致的。据此提出假设 1: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自我控制影响运动员反社会行为。

尽管以往研究揭示了自主控制对反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 然而, 对其中内在影响机制的深入分析仍有待探究。国内外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自主控制与情绪调节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情绪调节被定义为调节与情绪相关的生理过程和内在感觉状态的形式、强度、持续时间和发生的过程, 作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12]。换句话说, 情绪调节可能反映了青少年如何影响他们的情绪, 以及他们如何体验和表达情绪^[13-14]。研究发现, 根据贺淑红等人的研究, 自我控制能力与大学生的感情调节有着密切的关系^[15]。同时, 有学者也证明了情绪调节的方法对自我控制的特定层次产生了影响^[16]。另有学者提出情感调整的过程中需要自我控制能力的参与, 原理也就是自我控制能力资源有限理论指出, 自我控制能力作为一种情感认识资源, 其力量是有限的, 而情感调整则是一种情感向另一种情感的转化, 在这种过程中就必须耗费大量自我控制能力这种情感认识资源。另外, 调查也表明, 情绪因素一直以来被看作影响反社会活动(攻击)产生的重要因素^[17-18]。自我调节理论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自我控制的过程, 个体可以通过认知、行为和情感方面的调节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反社会行为可能是由于情绪调节能力较弱, 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导致的。目前,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情绪调节、反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19-20]。情绪调节与青少年适应困难(如犯罪、反社会行为和抑郁)呈负向且显著相关^[19-22], 但在比赛情境下情绪调节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研究却甚少。据此提出假设 2: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情绪调节在自我控制与反社会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

然而, 在运动员反社会行为中的有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复原力作用模型认为^[23], 环境因素能够通过改变个人特质影响心理复原力, 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由此, 本文引用心理复原力作为调节变量, 查看是否可以调节情绪调节与反社会行为的关系。心理复原力(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指的是一个人在面对逆境、挫折和压力等负面事件时, 能够自我调节、适应、恢复和成长的能力。心理复原力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面对挑战和困境, 并从中汲取力量和经验。研究表明, 具有心理复原力的人在面对负面事件时, 更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如积极寻求帮助、积极思考、接受自己的情绪等, 从而更好地调节情绪。相反, 缺乏心理复原力的人在面对负面事件时, 往往会出现消极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如情绪失控、沮丧、抑郁、焦虑等。过去的研究表明, 复原力在调节其他变量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可能发挥作用。举例来说, 在面对挫折情境时, 心理复原力低的个体有明显的内在攻击开始效果, 而复原力高的个体没有明显的内在攻击开始效果^[24]。对压力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研究中指出, 低水平复原力的社会环境下, 压力感受可以明显影响学生反社会; 高水平心理复原力的比赛情形下, 压力感受并没有明显影响他们的运动反社会活动行为^[25]。由此提出了假设 3: 在比赛情景下, 选手心理复原力在情绪调节和运动反社会行为当中起着重要调节作用。

在比赛情境下, 运动员的情绪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些因素可以对运动员的反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在比赛中, 运动员可能会遭遇各种挫折和压力, 例如输掉比赛、受伤、被禁赛等, 这些情境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自

我控制和情绪调节能力, 从而导致反社会行为。在本文中心理复原力则是一种能够帮助运动员从压力和挫折中恢复并提高表现的能力。其正向调节作用能够进一步加强运动员的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能力, 从而减少反社会行为, 据此提出假设 4: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自我控制通过情绪调节对运动反社会行为的间接影响受到心理复原力的正向调节。

综上所述, 自我控制、情绪调节、心理复原力既然这些因素都对运动反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那么它们在该行为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呢? 本研究基于理论视角, 并结合以往研究结果, 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参见图 1), 以探究自我控制、情绪调节、心理复原力对运动员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揭示了自我控制对于运动员运动反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以及心理复原力在运动员运动反社会行为调节作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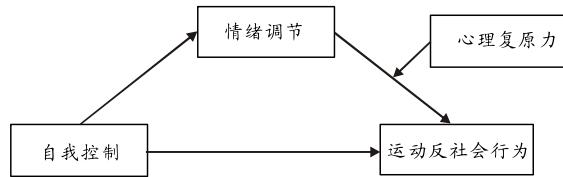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假设模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 研究方法

1.1 对象

研究以北京市运动队, 天津市运动队其中 388 名运动员为被试, 这项研究共发行了 398 份问卷调查, 成功回收和有效的问卷调查有 388 份, 有效性为 97%。在这些有效样本中, 包括男性参与者 184 人(47.3%), 女性参与者 204 人(52.4%); 运动员平均年龄为 16~25 岁($SD=0.489$)。

1.2 工具

1.2.1 自我控制量表

该论文使用了由 Tangney^[11]编写的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基础上, 共涉及十九个部分, 包括了抵御诱惑、冲动管理、健康行为、专注工作, 以及控制娱乐等五大层面。将各分数相加后即得到总成绩, 得分越高说明对自己的控制得更好。若通过测试后, 在本项目中的控制数据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分数约为 0.880, 说明量表的可信性较好。

1.2.2 心理复原力量表

这项研究使用 Yu 和 Zhang^[26]修改的复原力量表来评估青少年的复原能力。问卷共包含 25 个项目, 采用了 5 分评分系统。在这项研究中, 整个问卷的克朗巴赫 α 的系数为 0.927。

1.2.3 运动反社会行为量表

运动反社会行为量表描述, 由 Kavussanu 等人在 2009 年编制^[2]。该量表包括对队友和对手的 13 种运动反社会行为, 其中对队友的 5 种反社会行为, 对对手的 8 种反社会行为。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分制, 该量表的信度指标具有统计学意义, 可以作为研究运动员反社会行为的有效测量工具, 该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950。

1.2.4 情绪调节量表

情绪调节量表主要评估个体在情绪调节过程中使用不同

策略的频率,由斯坦福大学 Gross 等人编著的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13],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情绪调节量表之一,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由 10 个项目组成。该量表展现了较高的信度,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889。

1.3 程序与数据处理

在研究中,我们使用了综合问卷来进行调查。问卷中强调参与者的真实回答,保障个人信息的机密性。我们使用了 SPSS 25.0 统计分析软件和 MPLUS 8.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4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为了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我们采用了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特征根大于 1 的 10 个共同因素,通过计算,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变异量的 20.877%。该结果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27],表明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研究结果

2.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自我控制、情绪调节、运动反社会行为和心理复原力的相关分析见表 1。首先,自我控制和心理复原力相关不显著,证实了自我控制和心理复原力的确存在着正交关系,应当分开进行研究。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自我控制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 1 自我控制、情绪调节、运动反社会行为和心理复原力的相关矩阵

	自我控制	情绪调节	运动反社会行为	心理复原力
自我控制	1			
情绪调节	0.309**	1		
运动反社会行为	-0.434**	-0.431**	1	
心理复原力	0.053	0.103*	-0.175**	1

注: * $p<0.05$, ** $p<0.01$, 下表同。

2.2 结构模型分析

以自我控制为预测变量,情绪调节为中介变量,运动反社会行为为结果变量,心理复原力作为调节变量,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2)。经过检验后,我们发现各拟合指标表现良好: $\chi^2=4166.495$, $RMSEA=0.049$, $df=2138$, $CFI=0.929$, $TLI=0.927$, $SRMR=0.045$, 满足拟合要求。并且采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我们进行了 5000 次样本抽取进行检验,发现以下结果: 情绪调节在自我控制和运动反社会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如表 2 所示,间接效应占比为 23.34%; 直接效应占比为 7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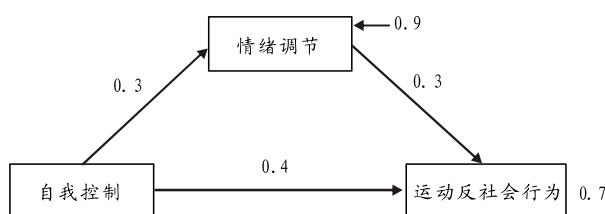


图 2 情绪调节在自我控制和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表 2 中介作用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	效应值 β	Bootstrap SE	95%LCI	95%UCI	Ratuo(%)
总效应	-0.5145	0.0543	-0.6213	-0.4078	-
间接效应	-0.1201	0.0297	-0.1828	-0.0665	23.34
直接效应	-0.3944	0.0536	-0.4998	-0.2890	76.65

2.3 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根据假设 3: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心理复原力在情绪调节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发挥调节作用,提出了如图 3 所示的调节效应模型。具体控制效果验证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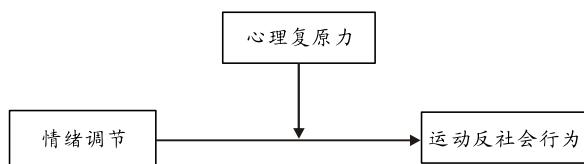


图 3 调节效应模型图

在情绪调节与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中,心理复原力的调节作用显示,交互项自情绪调节和心理复原力对运动反社会行为的路径为 0.108, 95% CI=[0.099, 0.2065], 不包含 0, 表明调节效应显著。

为了进一步检验心理复原力在情绪调节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我们采用了简单斜率检验进行进一步分析。通过正负一个标准差来绘制斜率图,具体结果请参见图 4,可以明显看出高心理复原力的情况下,发生运动反社会行为的效应会更低。高水平心理复原力的条件下,情绪调节对运动反社会行为正向显著预测;低水平心理复原力的条件下,情绪调节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反社会行为。这表明情绪调节对运动反社会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并且随着心理复原力水平的增加,这种预测作用也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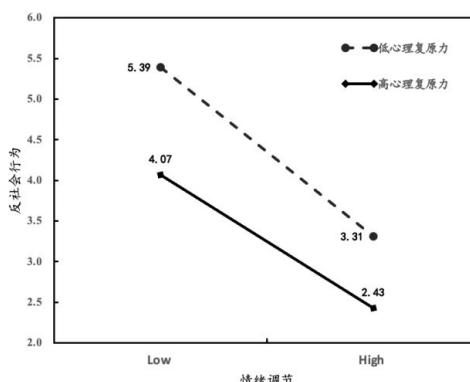


图 4 心理复原力在情绪调节与运动反社会行为间的调节效应

2.4 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调节中介效应模型,通过 Mplus 程序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详情如表 3 所示。作为因变量的运动反社会行为和心理复原力作为调节变量的分析结果,调节的参数指数 0.028, 95% 的置信区间从 0.001 到 0.057, 不包括 0 在内,因此解释为存在调节的中介作用。如表 4 所示,随着心理复原力

增加,中介效应增加(-0.142, -0.116, -0.090)。由于显示有调节的介导效果,所以根据心理复原力水平,观察了间接效果。心

理复原力的水平各个水平的调节介导作用分别在 95% 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说明调节中介显著。

表 3 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分析		Estimate	S.E.	95%LCI	95%UCI
自我控制→情绪调节→运动反社会行为	Low(-1SD)	-0.142	0.035	-0.211	-0.077
	Middle(0)	-0.116	0.029	-0.177	-0.062
	High(+1SD)	-0.090	0.029	-0.149	-0.038
	Moderated mediation	0.028	0.014	0.001	0.057

3.1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自我控制影响运动员运动反社会行为

本研究发现,比赛情境下运动员自我控制与运动员运动反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在体育运动中,尤其是在比赛情境下,自我控制是运动员在面对压力,比赛成绩和挑战时调节情绪和行为的重要能力,它能够帮助运动员控制情绪、提高专注力和应对挫折。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的运动员更容易表现出运动反社会行为^[28]。这种现象可以用个体—环境交互理论来解释。根据该理论,个体的行为是由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而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在比赛情境中,环境压力和竞争压力会影响运动员的情绪和行为,而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的运动员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表现出运动反社会行为^[29]。因此,在比赛情境下,提高运动员的自我控制能力可以减少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发生。教练员可以通过培养运动员的自我控制能力,如情绪管理、专注力训练等方法,帮助运动员更好地应对比赛中的反社会行为发生。支持假设 1。

3.2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情绪调节在自我控制与运动反社会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

运动员在比赛情境下的情绪调节在自我控制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在比赛情境下,运动员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和情绪激动,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表现。情绪调节是控制和管理情绪的过程,可以帮助运动员在比赛中保持冷静和专注。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控制显著正向影响情绪调节^[30]。此外,也有学者支持本研究结果,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对反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1]。这种现象可以用个体—环境交互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是由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而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在比赛情境中,环境压力和竞争压力会影响运动员的情绪和行为,而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的运动员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表现出运动反社会行为。因此,在比赛情境下,提高运动员的自我控制能力可以减少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发生,情绪调节在比赛情境下的运动员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总之,可以帮助运动员保持自我控制、提高情绪调节能力、预防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发生。支持假设 2。

3.3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心理复原力在情绪调节与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运动员在比赛情境下的心理复原力在情绪调节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比赛情境下,运动员需要面对各种情绪挑战,如压力、焦虑等,这对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表现都会产生影响。而运动员的心理复原力则可以发挥调节作

用,有助于帮助运动员应对情绪挑战,调节情绪,以及减少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研究也发现,心理复原力能够正向调节情绪调节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是因为具有心理复原力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负面事件,从而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进而降低了出现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此外,心理复原力还能够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效能感和社交支持网络,从而使个体更容易避免反社会行为,更能够积极地融入社会,因此,具有心理复原力的人相对来说更容易拥有良好的行为表现。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复原能力强的个人在遇到困难时可以积极调节感情反应^[32]。他们可以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33],获得更持久的认知和人力资源^[34]。复原力的双重加工理论表示^[35],面对心理复原力的处理方法可以分为肯定/否定情绪和自动/控制处理 4 种类型。研究表明,复原能力高的个人可以灵活运用积极的感情管理战略来调节自己的感情经验,体验和表现更多的积极的感情^[35]。支持假设 3。

3.4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自我控制通过情绪调节对运动反社会行为的间接影响受到心理复原力的正向调节

本研究发现,运动员在比赛情境下的心理复原力在自我控制与情绪调节,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调节中介作用。在比赛情境下,运动员的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能力对于预防运动反社会行为非常重要。心理复原力可以对这些因素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心理复原力是一种能够帮助运动员从挫折和压力中恢复并提高表现的能力,它能够提高运动员的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减少反社会行为。支持假设 4。

4 结论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的自我控制能力对于运动反社会行为具有明显的负向预测作用;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的情绪调节在自我控制和运动反社会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的心理复原力对情绪调节和运动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

比赛情境下运动员自我控制通过情绪调节对运动反社会行为的间接影响受到心理复原力的正向调节。

参考文献:

- [1] MAXWELL J P. Anger rumination: An antecedent of athlete aggression? [J].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04, 5(3): 279–289.
- [2] KAVUSSANU M, BOARDLEY I D. The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

- havior in Sport Scale [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09, 31(1):97–117.
- [3] MARIA K. Moral behaviors in sport: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2008, 1(2):124–138.
- [4] MARIA K. Motivational predictors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football [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2006, 24(6):575–588.
- [5] LUKE S, MARIA K, JOAN D. Goal orientations and moral identity as predictors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functioning in male association football players [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2006, 24(5):455–466.
- [6] SAGE L, KAVUSSANU M. Multiple Goal Orientations as Predictors of Moral Behavior in Youth Soccer [J]. The Sport Psychologist, 2007, 21(4):417–437.
- [7] KAVUSSANU M, STANGER N, BOARDLRY I D. The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Sport Scale: further evidence for construct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2013, 31(11): 1208–1221.
- [8] MEAD L N, BAUMEISTER F R, GINO F, et al. Too tired to tell the truth: Self-control resource depletion and dishonesty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9, 45(3):594–597.
- [9] COYNE A M, WRIGHT P J. The stability of self-control across childhood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4, 69(2):144–149.
- [10] GAILLIOT M T,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et al. Self-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 source: willpower is more than a metaphor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2):325.
- [11] TANGNEY J P, BAUMEISTER R F, BOONE A L. High self-control predicts good adjustment, less pathology, better grades, and interpersonal succes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4, 72(2):271–324.
- [12] NANCY E, SHEFFIELD A M. Children's emotion-related regulation [J].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2002, 30(2):189–229.
- [13] GIOMBINI L. 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 [J]. Advances in Eating Disorder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5. DOI:10.1080/21662630.2014.953321.
- [14] GROSS J J. The Extended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Elaborations,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5, 26(1):130–137.
- [15] 贺淑红, 马慧芳, 马海林. 藏族大学生情绪调节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关系 [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2, 39(4):205–208.
- [16] 王华荣, 李安. 中学生情绪调节方式、自我控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 [J]. 青少年犯罪研究, 2010(4):54–63.
- [17] ANDERSON C A, BUSHMAN B J. Human aggression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53(1): 27–51.
- [18] BUSS A H, PERRY M.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3(3):452–459.
- [19] BUCKHOLDT K E, PARRA G R, JOBE-SHIELDS 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Through Parental Invalidation of Emotions: Implications for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4, 23(2):324–332.
- [20] CRISS M M, HOULTBERG J B, CUI L, et al. Direct and indirect links between peer factors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difficulties [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6, 43:83–90.
- [21] COMPAS B E, JASER S S, BETTIS A H, et al. Copin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meta-analysis and narrative review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7, 143(9):939–991.
- [22] YAP M B H, ALLEN N B, O'SHESA M, et al. Early adolescents' temperament, emotion regulation during mother – child interacti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11, 23(1):267–282.
- [23] CONNELL J P, SPENCER M B, ABER J L. Educational risk and resilience in African-American youth: context, self, action, and outcomes in school [J]. Child development, 1994, 65(2):493–506.
- [24] 王玉龙, 钟振. 挫折情境对不同心理弹性个体内隐攻击性的启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2):209–212.
- [25] LEE H H, CRANFORD A J. Does resilience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roblem drinking and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J].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08, 96(3):213–221.
- [26] YU X, ZHANG J. 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with Chinese people [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 35(1): 19–30.
- [27] 刘红云, 骆方, 张玉, 等. 因变量为等级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J]. 心理学报, 2013, 45(12):1431–1442.
- [28] GOTTFREDSON M R, HIRSCHI T.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M]. New Yor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9] TEHRANI D H, YAMINI S. Parenting practices, self-contro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020. DOI:10.1016/j.jcrimjus.2020.101687.
- [30] 苗娇. 正念干预对女性戒毒人员的情绪调节和毒品渴求的影响: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D]. 山东师范大学, 2019.
- [31] 冯泰熙, 祝大鹏. 体育情境中认知情绪调节对亲社会: 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道德认知的中介作用 [J]. 湖北体育科技, 2022, 41(10): 903–907.
- [32] TUGADE M M, FREDRICKSON L B. Regul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7, 8(3): 311–333.
- [33] TUGADE M M. 10 positive emotions and coping: Examining dual-process models of resilience [J].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tress, health, and coping, 2010. DOI:10.1093/oxfordhb/9780195375343.013.0010
- [34]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 [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218–226.
- [35] 雷鸣, 戴艳, 肖宵, 等. 心理复原的机制: 来自特质性复原力个体的证据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6): 874–882.